

地理、移民与历史：古代中国汉字边疆传播的特征

丁君涛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从商路、地理环境、人口和历史来观察我国汉字的边疆传播历程,能够发现传统社会中汉字的传播特征,其传播并非单向辐射,而是依人口流动,沿多种通道扩展,长江、黄河流域作为汉字发展的核心,为长期稳定传播提供了基石。丝绸之路等商路则促进了汉字向西的广泛传播,维护了国家主权,促进了边疆地区的融入。汉字在边疆的传播因地理、历史和文化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交通改善与国家力量深入加速了汉字在边疆的传播。移民、屯戍者通过办学等形式推动了汉字传播,促进了民族间交流融合。汉字作为中华文化核心,承载了汉族文化传统,也融合了其他民族特色,其传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在当今,汉字的传播仍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汉字传播;古代地理环境;边疆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99(2025)02-0172-04

汉字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一历史过程既是一个逐渐完善且成熟的进程,也是一个不断由核心向边疆扩展的历史,二者共同构成了我国通用语言传播的历史。汉字的传播过程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在边疆的广泛传播既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基础,亦是边疆融入祖国大家庭的象征。陆锡兴、郑阿财等学者对于汉字在边疆的传播进行了研究^[1],这些研究细致的描述了汉字在边疆地区的传播过程,分析其传播原因与意义等,当前的研究,尚未从宏观的角度探讨汉字在边疆传播的逻辑,语言学理论对于语言文字的传播提出了一些解读,如Q值理论、选择主义、语言帝国主义、语言传播政策理论等,学术界对于语言文字的传播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了各种语言传播模型,这些语言传播模型可以用来解析古代中国社会汉字传播的特征,以为借鉴。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扩散模型、波浪模型、移民模型、语言政策模型为分析古代中国社会汉字的传播提供了理论的支撑。这些理论能够为分析古代中国社会汉字在边疆传播提供一种规律性的认识,为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古代中国社会文字传播的地理特征

古代中国的商路承担了汉字传播的重要通道,而这些通往边疆的商路,有许多都与民族走廊保持密切的联系或者重合。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汉字也由中原通往边疆地带,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地理形态、商路条件、水系、人口密度都对文字的传播构成重要的影响,在这些要素的影响下,古代汉字的传播并不是自然的由中心向周边辐射,构成同心圆,而是以人口流动为核心,顺着各类通道扩展。因此,古代社会的地理条件对于中国汉字的境内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当前,通用语言文字的广泛传播亦需要克服此类地理困难,实现推广的目标。在汉字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最关键的地理优势在于,长

江流域、黄河流域成为我国汉字发展的核心区域,这一核心区域地域广阔、人口密集,使得其他文字难以对其构成颠覆性的冲击,为其长期、稳定的向周边传播提供了重要基础。

古代汉字在向西传播的过程中,主要借助了丝绸之路等商路的便利,在传播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地区的汉字普及率就比较高,而进入西域地区后,则发生了变化,西域地理环境复杂,有高山、沙漠等,因此,境内汉字的传播与使用仍具有显著的差异,在临近河西走廊的吐鲁番、哈密等地,汉字使用较早且普遍,而远离主要商路,且受塔克拉玛干沙漠影响较大的喀什、和田等地区,则汉字普及比较困难。新疆境内的汉字传播有一个由天山南麓向天山北麓迁移的过程,在唐五代及之前,丝绸之路主要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向西扩展,沿途所经过的且末、于阗、龟兹等地区,都留下了大量汉字所使用的历史印记。在天山北麓,则主要是草原地带,虽然可以通行,甚至通行条件更好,但是,有些草原游牧民族仍处于敌对状态,商旅通行风险较高。直到清代统一天山南北以后,其北麓进行大规模开垦,北麓成为联接中外的重要通道,其汉字推广才逐渐超过南麓。

青藏高原、巴蜀地带及以西一带,则因其地形的原因,汉字传播受到的影响较大,特别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地带原有一些路网,吐蕃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将分散的路网整合,加强与丝绸之路的互动,使得汉字亦传播入高原,但是,地域广大、人口稀疏的高原地带,严重阻碍了文字的普遍传播。巴蜀地带及以西一带,在秦代推行文字统一以后,四川平原地带的汉字得到很大程度的使用,在出土文献中也得到了印证。而云贵川的部分山区,虽然以政令的方式要求统一文字,但是,汉字的推广使用,受到山地影响较大,当地也形成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字,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字交流互动,交通得到显著改善以后,汉字才逐渐在这些地区普遍应用。

向南传播的过程中,受到水系、山区的影响比较大,逐

收稿日期: 2024-12-10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通用语言文字在我国边疆地区传播路径的历史追溯与当代启示研究”(22Y131)

作者简介: 丁君涛(1985—),男,湖北仙桃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步向边疆扩展,是逐渐由长江流域、湘江流域至珠江流域的进程,水系既是汉字传播的重要障碍,也是重要工具。一旦开发其水系的航运作用以后,沿水系一带即很容易接受汉字的传播,如江西地区,虽然山地很多,但赣江水系贯穿全境,沿江地带人口密布,成为汉字传播的重要场域。靠近海洋的浙江、福建等地,虽然山地众多,但是,临近海洋的地理优势,使得其能够通过海洋与其他地区保持密切的联系,其境内水系自北向南,人口多聚居于沿海地带,能够为文字传播提供交通便利。在水系难以覆盖,或者中心辐射力量不够时,容易在一些山区地带,形成少数民族语言与汉字交融的状况,如汉字壮文、汉字苗文、汉字侗文等,一些少数民族“在掌握汉字之后,又不满足于仅用来标志汉语,还希望用来标志本族语言,所以,汉字在岭南的传播自然而然地会出现标志本地语言的方字”^[2]。

北方地区,特别是蒙古高原的汉字传播比较特殊,草原地带地域广阔、人口稀疏,存在多个部落,虽然草原地区便于交通,也形成了草原丝绸之路,但是,这条商业道路仅仅串联长城北麓的边缘地带,仍没有足够的力量渗透入草原的深处,其影响仍然是东西向的,长城沿线地区。由于传统农耕经济与草原经济有许多不可调和之处,二者之间战争或互市常常交替进行,汉字传播并不是持续的。蒙古南部,在一些人口密集、水草丰美,且便于通往内地的地带,则汉字使用较多,如临近河北、山西等省的地区,就发现了大量使用汉字的印记。当建立跨越长城或者深入长城的政权时,少数民族常常不得不主动接受并大量使用汉字,而这种文化亦随着少数民族深入蒙古高原,汉字的传播也正是在这种冲突与交流中完成的,“北方少数民族在汉族文化与自身文化的不断比较和冲突中最终完成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3]。

纵观汉字在边疆地区的传播过程,可以发现,其传播路径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传统农业社会,交通条件较差,汉字传播速度并不快。当商路中断,国家力量辐射有限时,汉字传播的进程也会退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又兴盛起来,替代汉字的主流地位。随着近代交通运输业的改善,人口迁徙的变化,国家力量深入边疆地区,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汉字的传播速度迅速加快,在这种长期、波浪式的传播下,汉字逐渐在许多边疆地区成为主流语言文字。

二、移民教育对于古代汉字传播的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的移民在向边疆迁移定居的过程中,也将汉字传播入边疆地区,移民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汉字的传播,以西北地区为例,移民到达西域一带后,开办学校,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语言也进行了互动。

这些官方组织的移民与民间自发的移民到达边疆后,自然也与当地民众进行各种形式的语言交流,推动汉字的广泛传播,这些传播行为中,影响最大的是开办各类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既有政府开办的,也有民间私塾,两者成为了汉字传播的重要中心。

在罗布淖尔地区的考古发掘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九九”口诀残件,《急就篇》《论语》《左传》《战国策》等残卷。这些文物证据表明,当地的汉族屯戍者一直在

对后代进行汉字的教育工作,为传承和发扬汉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一些与汉族长期杂居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学会了使用本民族语言或汉语。这使得汉语在西域地区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沟通工具,不仅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理解,还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在尼雅出土的木简中,就有少数民族以汉字书写的信件,抄录如下:

- 1.王母谨以琅玕|,致问王
- 2.臣承德叩头,谨以玫瑰|,再拜致问大王
- 3.休乌宋耶谨以琅玕|致问小太子九健持
- 4.君华谨以琅玕|,致问且未夫人
- 5.太子美夫人叩头,谨以琅玕|致问夫人春君
- 6.苏且谨以琅玕|,致问春君
- 7.苏且谨以黄琅玕|,致问春君
- 8.奉谨以琅玕|,致问春君,幸毋相忘^[4]

木简中的一些人名,显然是当地居民,“休乌宋耶、九健持、君华、春君、苏且、奉、承德,这些人名,有的明显为精绝土著人名,如休乌宋耶、九健持、苏且等,另一些则明显为汉名,如春君、承德”^[5]。汉政府也有意识地进行汉语言文字教学,以利于王朝政令之统一,主观上是基于政治的需要,客观上促使民族间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唐代屯田的规模远超汉代,仅常驻士兵就有3万余人,还有迁居西域的民众。唐代封常清“外祖犯罪流安西(今库车)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6],此类遣滴西域的人犯,最后也定居于西域,其也进行了文化的传播。唐朝政府对于教育文化的重视程度可谓深远,在汉人集中的地区,政府有意识地设立州学、县学、乡学等各级学校,为民众提供学习的机会。以伊、西、庭三州为例,每个州的学生定额为150人。此外,安西四镇都督府的学生定员也在350人左右。再加上十二个县学,每个县学的学生定员为360人。至于乡学学员,数量更是以千计。可以看出,唐朝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是全方位的,从州到县,再到乡,层级分明,覆盖面广。在这些学校里,学生所阅读的书籍与人们熟悉的儒家经典并无二致,如《礼记》《尚书》《论语》等。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也使他们具备了良好的道德素养。此外,学生还会学习《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以此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和基本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唐朝政府不仅在当地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也使得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民众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

在建省之前,清政府在新疆地区部署了大量满蒙军队,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伊犁将军明瑞上奏请求在伊犁的八旗中“每旗各设清书书房一所,每书房教习二人,分司教书教弓,学生无定额,派满营官管理,年终派员考课”^[7],这些学堂是清代新疆旗学之始。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伊犁将军永贵认为驻防新疆的八旗“为各部落总汇之区,凡国语、蒙古、汉文均须熟悉”^[8],于是提出分别设立满、汉、蒙古官学。此后,在新疆其他地区也分别设立了学校,官学的规模显著扩大。清政府不仅设置了官学,还积极推动义学的发展,新疆义学的设置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重视普通民众的教育问题,提出设置义学,“请于每城置房数间,各设义学一所”^[9],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于“两满营特设义学一所,派协领

等官管理,满洲、蒙古、汉字教习各一人,官学生各三十二名”,同时要求义学也要“按年考核”^{[7]497}。在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下,新疆地区的义学规模得到长足发展。清政府对于义学也进行了细致的管理专门派遣人员到义学中进行治疗,“近俱选派效力当差文废员,每处一二名不等,前往教读,并有派武废员,在各营教习弓箭”^{[9]407}。对于义学的经费问题,政府也专门拨出来房屋、土地等,以资产的收入作为义学运转的经费。总体而言,在新疆建省以前,新疆地区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体系为文化的普及和同步提供了通道,使传统儒家文化在新疆地区影响力得到彰显。

三、汉字主动传播的长期历史

在汉字边疆传播的一个特征,在于长周期的语言文字互动,在这一长周期中,政府与民间成为推动汉字传播的双重动力,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为例,政府是汉字传播的主要推动者,在这种推动之下,民间也自发进行语言文字互动。

汉通西域以前,西域地带就与内地有着自发且密切的文化交流,在一些考古活动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石器、铜器等,在图案、纹饰等都与内地高度相似,特别是阿勒泰市克尔木齐古墓群第22号墓所发现的战国时期铜镜,“形制和大小都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基本一致”^[10],这也证明了两地在文化上的交流。西域文化也在这一时期传入内地,史料和考古都证明“新疆在先秦时,就与中原地区存在着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友好往来”^[11],这种自发的文化交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奠定了基础。

张骞开通西域的通道后,汉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推广,致力于将中原文化传播至边疆地区。尤其是在西域都护府成立之后,汉语言文字作为官方语言,在西部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这样一来,中原文化逐渐在西部地区扎根,促进了汉民族与西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为了进一步加强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力,汉政府在西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吸引了大量汉族民众移民至此。这些汉族移民的迁入,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交流。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汉族文化与西域文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

当然,汉代的文化传播主要依靠政治、军事,汉政权对于西域的控制也比较有限,对于底层的政治生活介入并不深,“汉文化的影响还未能达到改变已高度发达的西域文化的性质和改变其潮流的程度”^[12]。

唐政府对于西域的控制,则远强于两汉时期,唐官吏参与到西域基层社会的治理之中,汉语言文字在西域得到普遍的应用。除了依靠教育,唐代也积极加强宗教管理,通过加强对僧籍的管理,唐政府实现了国家对于宗教的控制,唐代“对佛教、道教的管理,中国的历代政府不过是把百姓的管理办法移植到佛教、道教方面而已,这种以人身管理为核心的编户齐民方式,在中国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成熟的”^[13]。通过这种成功的宗教管理政策,唐代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到西域一带,当地居民在宗教的影响下,大量以汉字抄写佛经等,使得汉语言文字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唐代民间生活中,常常使用的各类契约也与汉代发生了

显著的区别,汉代西域地区所写的契约文本,以当地语言为主,较少使用汉文,但是,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活跃,汉语言文字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语言之一,一些胡人在购买大宗商品时,也以汉字来书写契约,如《唐代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石染典买马契》,原文抄录如下:

- 1.马壹疋驢敦六岁
- 2.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拾捌
- 3.疋,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
- 4.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
- 5.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事。恐
- 6.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 7.练主
- 8.马主别将康思礼年三十四
- 9.保人与胡罗世那年四十
- 10.保人与胡安达汉年四十五
- 11.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14]

此处的马主康思礼,将驢敦六岁马,以大练拾捌匹的价格卖给石染典。此处的大练也是丝织品的一种,在西北地区较为流行,天宝年间,大练一匹在西州大约值铜钱460文^[15]。此处的“驢”表示赤鬃黑色毛的马,出卖的马匹,质量也较好,于西州地区购买。契约中的石染典即为胡人,其买马进行贸易也以汉字进行书写。一些少数民族虽然书写契约使用的是少数民族文字,但是,其运用中仍有许多汉文化的色彩。

清代在新疆地区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教育推广工作。新疆建省以后,其教育普及更加全面,政府设置了各类学校,近代化的学堂教育在新疆得到一定的普及,仅迪化地区,“仅设立的中等或中等职业学校就有省立法政学堂、省立实业教员讲习所、省立初级师范学堂、省立巡警学堂、省立中俄学堂、省立将牟学堂、省立陆军小学堂、省立中学堂等学校,共有教员61人,学生895名,教育经费100 597两”^[16]。各类学校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水平得到普遍提升,仅吐鲁番地区,“该厅义学八堂,据称三堡、鲁克沁、汉墩、连木沁四塾均缠童,老城一塾尽系回、汉,新城参用缠童四名,托克逊、辟展参用回、汉二三名”^[17],受教育的学童多是少数民族学生。政府有意识地推动教育工作,使得文化得到普及,国家认同的观念开始逐渐深入人心。

教育固然是文化推广的重要通道,但政治、军事则是保障文化推广的重要基础。清统一新疆以后,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日渐密切,往来商业、基层治理等多使用汉语言文字,以契约为例,当地少数民族虽然有些仍以察合台文书写契约,但是,契约的合法性保障仍以政府颁发的契尾为准。私人订立的契约需要向政府缴纳契税,填写汉字契尾,才能够成为红契,获得合法性。在政府的推动下,双语合璧契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既是为了保障契约的履行,也是为了契约合法性的获得。因此,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深入基层的治理,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实现了汉字的推广,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传播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结语

从历史、地理、文化的角度观察,我国汉字的边疆传播

历程,能够为今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工作提供一个新视角,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汉字自身的生命力,也映射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坚韧性。汉字的边疆传播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息息相关,在历史的洗礼中,汉字不断吸收各地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今天独具魅力的汉字体系。汉字传播中,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黄河、长江流域作为汉字的核心理区域,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而广阔的边疆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呈现核心与边缘共振的特征,既为汉字的生存提供了基础,又为汉字的丰富提供了强大动力。政治权力的大一统习惯,使得汉字推广成为历代文化工作的重心之一,人口的自然迁移使得汉字成为一种枢纽语言,桥接各少数民族,我国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汉字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与边疆文化融合,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体系的核心,不仅承载了汉族的文化传统,也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 [1]陆锡兴.汉字传播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季子越.唐代汉字文化及其传播分析[J].知识文库,2018(17):12;郑阿财.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J].浙江

-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6(4):5-17;孙德华.秦汉魏晋时期汉语文字在古代东北的传播——以高句丽为考察中心[J].语文建设,2015(30):79-80;张颖慧.汉字在西南山地民族中的传播与影响[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6(2):80-83;郑立.唐代汉字传播的途径及其影响[J].商洛学院学报,2009,23(1):70-73;宋恩常.汉字在瑶族社会中的传播及其演变[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3):25-28.
- [2]陆锡兴.汉字传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53.
- [3]魏宏利.北朝碑志所见北方少数民族之汉化[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00-104.
- [4]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29.
- [5]周永华.论西域文化与民族关系的发展[J].西北民族研究,2007(3):37-43+104.
- [6]刘煦.旧唐书(卷104)[M].北京:中华书局,1975:3207.
- [7]李毓澍.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 [8]杨建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史地文献卷(第6册)[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93.
- [9]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五卷)[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 [10]易漫白.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1(1):23-32.
- [11]陈慧生.汉代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J].西域研究,2001(3):1-6.
- [12][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M].耿世民,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101.
- [13]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6(3):136-143.
- [14]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48.
- [15]赵丰.唐代西域的练价与货币兑换比率[J].历史研究,1993(6):177-180.
- [16]徐亚栋.1884—1912年新疆教育述评[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34(7):74-76+128.
- [17]新疆档案局.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28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03.

Geography, Migration, and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cient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Ding Juntao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When investigating the course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frontier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route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 and history, we can find the dissemination course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was not a simple unidirectional radiation but rather a complex expansion driven by population movements along various routes.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 basins, serving as the heartl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can provide a stable foundation for the enduring dissemination. Trade routes such as the Silk Road facilitated the extensive westwar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inforc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fostering the integration of frontier regions.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exhibited significant diversity due to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The enhanced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and the strengthened state power accelera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se regions. Immigrants and military settlers promo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 educational initiatives and other means, encouraging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s the cornerstone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characters carry the traditions of Han culture while integrating elements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Their dissemination can reflect the diverse yet unified n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Nowadays,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providing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common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dissemination; geography

[责任编辑:师清芳]

(上接第160页)

- [8]Евгений Маркин.В Молдавии утвердил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EB/OL].(2009-04-22)[2024-12-11].<https://newdaynews.ru/kishinev/229958.html>.
- [9]Юлия Семенова Юдович.Консенсуса не случилось-2[EB/OL].(2009-05-13)[2024-12-11].<https://inosmi.ru/20090513/249029.html>.
- [10]Александр Артемьев.Президент Молдавии объявил амнистию участникам погромов в Кишиневе[EB/OL].(2009-04-16)[2024-12-11].<https://newdaynews.ru/kishinev/229189.html>.
- [11]Молдавия: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ставили лишь новые вопросы[EB/OL].(2009-07-31)[2024-12-11].<https://inosmi.ru/20090731/251197.html>.
- [12]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566.
-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
- [14]Владимира Воронина.Попыт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в Молдавии осуществлялась с участием граждан Румынии, заяв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Молдавии

- Воронин[EB/OL].(2009-04-10)[2024-12-11].<https://www.bfm.ru/news/82494>.
- [15]Экс-президент Молдавии обвинил фонд Сороса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госпереворота в апреле 2009 года[EB/OL].(2018-04-06)[2024-12-11].<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5099641>.
- [16]Сотни примаров Молдовы получили письма из Румынии с призывами к ликвидации молда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EB/OL].(2009-07-13)[2024-12-11].<https://qwaz.ru/moldova/pcrm/Sotni-primarov-Moldovy-poluchili-pisma-iz-Rumynii-s-prizyvami-k-likvidacii-moldavskogo-gosudarstva/>.
- [17]Владимира Воронин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VII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коммунисто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EB/OL].(2012-06-09)[2024-12-11].<https://uchebana5.ru/cont/3489058.html>.
- [18]Коммунисты Молдовы переходят в наступление[EB/OL].(2010-02-10)[2024-12-11].<https://kprf.ru/international/75657.html>.

Reasons of the Moldova Communists Party's Loss of Power

He Ping Tian Wanying

(School of Marxism,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 2009, the Communists Party of Moldova failed in the poll and lost power, which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of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The liberal factions ousted the Communists Party of Moldova step by step by creating the Chisinau riots, obstructing any party's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unists Party of Moldova, seeking early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finally forming an opposition coalition to counter the parliamentary majority. The Moldova Communists Party's loss of power is due to the overstrength of anti-communist forces in the West and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party itself. The Moldova Communists Party's loss of power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parties. Only b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all-round strengthening of Party building, plac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Party's work, not blindly copying the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 and striving to explore a democratic system suitable fo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can we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spac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partie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s Party of Moldova; parliamentary election; party building; color revolution

[责任编辑:师清芳]